

社会资本视域下青年社区参与边缘化的成因分析与重构路径

顾怡雯

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青年群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普遍呈现出在场却缺席的边缘化状态。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 从网络、规范、信任三个维度深度剖析了这一现象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 现代生活引发的“时空脱域”导致青年社会网络断裂, 传统的单向行政动员造成青年“认同悬浮”与规范失效, 而日常交流的匮乏与服务供给的错位则引发了普遍信任的缺失。为破解这一困境, 社区治理应顺应青年社交的分子化趋势, 通过空间生产与共居模式重构社会网络; 引入社群化再造与敏捷治理重塑互惠规范; 并通过精准服务与数字反哺重构信任机制。本研究旨在为构建互惠共生的青年发展型社区, 以及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区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资本, 青年参与, 社区治理, 边缘化

Analysis on the Causes and Reconstruction Path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Yiwen Gu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6,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Youth groups generally exhibit a marginalized state of being “present but absent” i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introduc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networks, norms, and trus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ime-space disembedding” triggered by modern lifestyles leads to the rupture of youth social networks; traditional unilateral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causes youth “identity suspension” and the failure of reciprocal norms; while the lack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mismatch in service supply trigger a widespread deficit of universal trust. To break through this dilemma, community governance should adapt to the “molecularization” trend of youth socialization, reconstructing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space production and youth co-living models. It should also reshape reciprocal norms by introducing “community-based restructuring” and agile governance, and rebuild trust mechanisms through precise services and “digital giveback”.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youth-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exploring a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Youth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argin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建设互信互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代社区模式成为重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是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国家相关政策明确倡导，要促进青年群体机制化、常态化地融入社会公共生活，充分发挥青年在社区服务中的积极作用[1]。

在当下的城市社区中，青年群体虽然是居住主体，但在公共事务中却普遍呈现出边缘化状态。他们与社区邻里的互动频率较低，对社区组织的认同感不强，在行动上往往处于游离状态。这种“在场却缺席”的现象，不仅限制了青年的自我发展，也影响了多元主体协同的现代社区生态建设质量。青年群体为何在空间邻近的情况下依然难以融入社区？这种边缘化困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尝试引入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网络、规范、信任三个维度系统剖析青年群体社区参与边缘化的成因。通过分析社交网络、行为规范与组织信任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破解青年参与困境的可行路径，为推动青年融入社区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2.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青年群体在社区公共生活中的缺位与边缘化现象，已成为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议题。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学界对青年社区参与困境的成因探讨主要集中在微观个体状态与宏观制度环境两个向度。

在微观个体层面，多数研究从青年自身的时空结构与生活方式切入。肖泽磊等[2]指出，现代城市生活导致在职青年产生严重的“时空脱域”，工作与居住空间的分离使其陷入时间贫困，客观上削弱了

其参与线下社区事务的意愿与能力。这种脱域状态使得青年在物理空间上在场，但在社会关系上却趋于边缘。

在宏观制度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基层治理模式的结构困境与青年的心理认同障碍。姜利波[3]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域指出，当前社区治理的单向行政逻辑容易导致青年产生认同悬浮，使其难以建立起真正的主人翁意识；徐敏和刘靖北[4]在剖析大城市青年白领的参与逻辑时也发现，传统的行政动员模式难以契合现代青年追求平权与契约精神的心理预期。此外，赵云亭[5]等学者在探讨青年与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实践逻辑时，也普遍关注到治理体制张力对青年活力的抑制。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为理解青年社区参与的困境及嵌合式发展路径提供了丰富的解释框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陷入了“个体精力匮乏—宏观体制僵化”的二元分析逻辑。这种视角的局限在于，它们往往将青年视为孤立的原子化个体或被动的管理对象，较少从中观的社会互动结构层面去系统剖析青年与社区之间深层的关系断裂。

社区的本质并非物理空间的简单堆叠，而是社会关系的集合。青年难以融入社区，表象是时间与意愿的缺失，其深层症结在于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流失。基于此，本文尝试跳出现有的二元框架，引入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期望能更透彻地揭示青年社区参与边缘化的生成机理，并为其重构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1. 社会资本理论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6]。社会资本的概念经布迪厄[7]、科尔曼等人的理论建构，最终由帕特南发展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析框架。社会资本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结构中，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其核心价值在于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帕特南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明确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网络、规范、信任。“网络”是互动的基础结构，“规范”是互动的行为准则，“信任”则降低了互动的交易成本。三者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的循环系统——网络越密集，规范越容易形成；规范越稳固，信任越容易积累；信任越普遍，网络越容易扩展。

3.2.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尝试剖析青年群体在社区中普遍呈现边缘化状态的深层逻辑。具体而言，可从理论的核心三个维度将研究问题细化如下。

一是网络维度，关注的是青年群体在社区中是否形成了稳定的社会联结。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区分为黏合性资本与连接性资本[8]，前者指向同质群体内部的强联结，后者指向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联系。据此，本文将从两个层面考察社群青年群体的网络状况：一是青年与邻居的互动频率及社交网络规模，二是青年群体的网络是否与社区内其他群体有联结。

二是规范维度，关注社区内现有的规则能否获得青年群体的认同，规范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生成方式，内生规范比外生规范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认同感。具体而言，社区规范的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还是协商产生、社区规则与青年的行为方式是否存在冲突、青年是否认同社区内“相互帮助、共同受益”的行为准则。

三是信任维度，关注青年群体与社区内其他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信任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持续互动中逐步积累的产物。具体来说，是青年对居委会等组织的信任程度、青年对邻居的人际信任水平、以及这种信任是源于长期互动还是基于身份认同。

4. 青年社区参与边缘化的成因分析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青年在社区治理中的边缘化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网络、互惠规范与普遍信任三个要素共同失灵的结果。要理解这种失灵，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当代青年的冷漠或自私，而必须深入剖析青年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之间产生的深层断裂。

4.1. 社会网络断裂：生活空间的脱节与社交重心的外移

青年在社区中普遍呈现出在场却缺席的特征。他们虽然住在这里，但社区里却几乎没有他们的社交圈。这种社会网络的断裂，是导致他们边缘化的首要原因。

其一，现代生活节奏导致了青年的时空脱域，今天的城市在职青年普遍面临较长的通勤距离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们的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是高度分离的。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中被称为“脱域”[2]，即青年的社会关系从传统的社区地缘中被拔出了。他们的肉体虽然居住在社区，但时间和精力却早已被工作和网络占据，导致物理空间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青年因此沦为了社区里的熟悉的陌生人。

其二，传统互惠网络的失效引发了资源互惠的悖论。在传统的熟人社区里，邻里之间的社会网络往往是靠“借个葱、搭把手”这类资源互换建立起来的。然而，学者刘成斌指出，随着高度发达的市场化服务，如外卖、跑腿、家政取代了传统的家庭与邻里功能，当代青年只需购买服务就能解决生活需求，传统的资源互惠模式对他们已经失效[9]。当邻居之间不再需要进行功能性的互助时，缺乏情感维系的社区网络自然就瓦解了。

其三，青年的社交精力转向了分子化的趣缘重构。面对社区内的社交空白，青年并未放弃社交需求，而是转向了新的社交范式。学者吴钊观察到，当代青年正在逃离沉重的传统人情世故，转而通过社交媒体寻找“饭搭子”、“遛狗搭子”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分子化”：青年们基于共同爱好和明确的边界，形成了一种短链条的自主交往结构[10]。这种精准而轻量的分子化社交虽然满足了青年的陪伴需求，但也从客观上把他们的社交精力从社区内部抽离了出去。

4.2. 互惠规范失效：单向的行政指令与青年主体意识的缺失

社区的规章制度想要得到大家的遵守，其前提是必须获得群体的高度内生认同。然而，青年对当前社区规范的认同感普遍偏低，这主要是因为规则的生成方式与青年的心理预期不匹配。

第一，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挤压了民主协商的空间。在当前的基层治理中，诸如垃圾分类、楼道清理等社区规范，大多是作为上级的行政任务直接下达给居民的。青年群体在这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对于习惯了平权交流和契约精神的现代青年来说，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指令很容易被视为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从而产生心理抗拒。

第二，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了青年的认同悬浮。为什么青年不愿意把社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一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社会分类，才会产生归属感。但在现实操作中，社区往往只把青年当作被动管理的对象或随叫随到的志愿者，而没有赋予他们实质性的治理决策权。学者姜利波将这种状态精准地概括为“认同悬浮”[3]：青年在社区中既不完全局外人，也无法真正融入核心治理圈层，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既然没有被当作主人翁，青年自然缺乏遵守和维护社区规范的政治自觉。

4.3. 普遍信任缺失：日常交流的匮乏与服务供给的错位

信任是维系社区运转的润滑剂。但在青年群体中，由于平时缺乏交流、关键时刻诉求又得不到满足，他们对周围的邻里和居委会等组织陷入了深深的信任危机。

一是日常互动的匮乏阻断了人际信任的生成。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在日复一日的打招呼、聊天和合作中慢慢积累。如前文所述，青年在社区里往往早出晚归，即使偶尔在电梯里碰到邻居，也多是低头看手机的短暂交集。没有了闲话家常的物理场域，也没有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的经历，青年与邻居之间长期处于互盲状态，深厚的人际信任便成了无源之水。

二是治理回应性的不足侵蚀了青年的制度信任。青年对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能否回应他们的现实痛点。然而，目前的社区公共服务大多向老年康养、儿童托育倾斜，而青年群体关注的停车难、宠物饲养空间、青年社交场所等问题却常常被边缘化。当青年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服务供给与自己的真实需求发生错位时，就很容易形成“社区工作与我无关”的刻板印象，进而导致对社区组织的制度信任流失。

三是不参与与不信任陷入了恶性循环。信任的缺失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因为不信任社区组织，青年会更加倾向于紧闭房门，拒绝参与任何公共事务；而越是不参与，他们与社区的信息鸿沟就越深，相互之间的误解和疏离感就越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彻底锁死了青年融入社区治理的通道。

5. 青年社区参与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维度去破解青年社区参与的边缘化困境，不能再走发文件、下指令、强行拉人头的老路。面对青年群体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社区治理必须转变思路，顺应青年的行为逻辑，从重构社会网络、重塑互惠规范、重建普遍信任三个方面入手，实现青年与社区的双向奔赴。

5.1. 重构社会网络：依托兴趣爱好与生活场景搭建互动平台

既然传统的地缘网络已经断裂，青年人的社交已经走向了基于兴趣的分子化，那么社区就不应强求青年去串门，而应该主动为他们的趣缘社交提供生长的土壤。

首先，需以空间生产理念重塑青年的物理与社交场域。过去社区给年轻人留下的空间往往只有快递柜和地下车库。学者程德兴在研究杭州市G未来社区时提出了空间生产的底层逻辑：社区不仅要造房子，更要为青年生产关系[11]。G未来社区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他们不仅在物理空间上打造了电竞组团、星空广场等极具青年吸引力的景观，更在社会关系层面通过举办潮玩音乐节、剧本杀等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青年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自然熟络。这种将物理空间与社交活动相融合的策略，能有效把青年从封闭的房间里拉出来。

其次，需推广青年共居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沉淀社会资本。面对大城市的孤独感与租房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与同龄人合租或入住青年长租公寓。学者庄皓琰将这种现象称为“作为生活策略的青年共居”[12]。社区治理可以敏锐地抓住这一趋势，引入或打造带有公共客厅、共享厨房的青年共创空间。当青年们在公共空间里一起做饭、看电影、分享生活时，一种类似于大学宿舍般的新型邻里关系便自然生成了。这种基于共同生活的弱连接，随时可以转化为参与社区互助的强连接。

5.2. 重塑互惠规范：打破单向管理，通过项目合作激发参与热情

第一，用社群化再造替代传统的行政动员。大城市的青年白领工作压力极大，传统的行政指令很难唤起他们的热情。学者徐敏在剖析上海市“青年智谷”案例时，提出了“社群化再造”的破局思路[4]。不要用居委会的口吻发通知，而是把社区事务包装成一个个有趣的项目。比如，将废旧自行车改造、流浪猫狗救助等议题，做成类似职场上的闯关式、体验式项目，招募有专长的青年组建社群来共同攻克。在具体操作上，社群化再造应遵循“议题孵化-社群招募-项目共创-成果共享”的闭环流程。社区需将治理目标拆解为微项目，通过线上合伙人招募令吸纳有专长的青年介入，实现从被动管理到项目共创

的角色转化。这种以社群作为方法的组织逻辑，契合了青年追求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心态，能极大激发他们的参与潜能。

第二，引入敏捷治理理念，在赋权增能中实现内生规范的自然生成。敏捷治理的落地依托于诉求限时响应机制与资源赋权机制，通过“小步快跑、迭代优化”的逻辑，提升社区对青年痛点问题的响应速度与治理韧性。例如24小时内分级反馈以及设立青年自主支配的微治理基金等，当青年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时，社区可以顺势探索设立“青年智囊团”或“青年议事会”。这不仅仅是给予青年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传统社区治理一种敏捷响应的能力。青年群体的扁平化思维和快速反应特征，能够有效打破基层科层制运转的迟钝与僵化。在推进这些微治理项目的过程中，青年社群内部必然需要协商与妥协，从而自发长出大家都认可的契约。这种机制不仅让青年在心理上完成了向社区主人翁的角色接纳，治愈了认同悬浮的危机，也让社区治理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5.3. 重建普遍信任：精准回应实际诉求，促进青年与社区的良性互动

信任的重建，本质上是一场心换心的过程。社区想要收获青年的制度信任，就必须先放下身段，真诚且精准地回应青年的生存与发展痛点。

一是通过精准的服务供给置换青年的组织信任。现代青年面临着婚恋交友、职业发展、子女托育等多重压力。如果社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需求，提供诸如“青年夜校”、“四点半课堂”或者单纯为“遛狗搭子”规划一块专门的宠物社交草坪，依托数字生态性重构社区的“附近”[13]，青年就会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度。当找居委会真的能解决实际困难时，青年对基层组织的刻板印象就会被打破，坚实的制度信任便会在这一次次的服务兑现中生根发芽。

二是构建基于数字反哺的嵌合式长效发展机制。理想的社区参与绝非青年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嵌合式发展[5]。社区为青年提供生活保障与情感慰藉，作为回馈，青年则可以发挥自身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禀赋优势，对传统社区进行技术反哺[14]。例如，青年可以组织社群教社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跨越数字鸿沟，或者利用专业特长为社区开发闲置物品流转、停车位共享的微应用。这种数字反哺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物质交换，更在社区内重塑了一种新型的代际互惠关系。通过这种齿轮般紧密咬合的双向互动，青年与社区彻底打破了不信任的壁垒，结成了真正的治理共同体。

5.4. 实践推行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具体的实践落地中，上述重构路径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现实环境与体制惯性的多重阻击。

首先是空间资源的错位。当前社区的物理空间大都被行政办公或老年康养设施占据，青年真正需要的沉浸式社交场域其实非常稀缺。要破解这一僵局，社区需要在有限的存量空间里探索一种空间分时共享模式。例如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办公用房在下班后或周末灵活转化为青年的社交与共创中心，这种低成本的空间微更新，能最快为青年的线下交往提供落脚点。

其次是科层体制的路径依赖。基层社区习惯了自上而下的下达指令，在面对需要柔性响应的敏捷治理时，往往会产生水土不服，最后导致赋权青年始终停留在表面。为此，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做中介是一个务实的选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在严肃的行政管理和活跃的青年社群之间做一个缓冲，既不破坏社区的底线规矩，又能给年轻人留下发挥活力的空间。

最后是高压生活带来的参与疲劳。平时上班已经透支了太多精力，年轻人在休息时间会更看重私人空间的边界。如果参与公共事务总是单向的无私奉献而没有正反馈，大家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因此，必须把激励机制真正做实，比如依托社区数字平台建立一套积分系统，青年的每一次出谋划策和志愿付出，都能实实在在地兑换成社区福利或信用回馈。只有让付出有切实可见的获得感，才能慢慢把他们主动参与社区的习惯培养起来。

6. 结语

青年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边缘化,并非源于他们个体的冷漠或自私,其本质是传统的管理型社区模式与现代青年平权化、原子化生活方式之间的深层断裂。通过社会资本理论的拆解可以发现,这种困境交织着空间脱域带来的网络断裂、行政动员导致的认同悬浮,以及服务错位引发的信任危机。要真正破局,关键不在于设计多少个临时的活动,而在于通过空间重构、社群赋权和精准回馈,重新激活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不再是被动的管理对象,而是社区韧性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主体。当青年群体带着他们的数字素养、创新活力融入社区,基层治理才真正具备了抵御风险、持续进化的内生动力。归根结底,拆除青年与社区之间的这堵无形之墙,不仅能让在高压城市中打拼的青年找到一处情感安放之所,更能为未来的社会建设注入长久的生命力。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是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青年社区参与困境的成因并提出重构路径,偏向于学理层面的推演。未来研究可结合大样本的量化问卷调查,或跨区域的多案例深度访谈,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及其对策的实际效能进行实证检验。

二是青年群体的内部异质性探讨。本文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范畴进行讨论,但在现实中,青年内部在职业形态、收入水平与居住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可进一步细化研究对比异地青年与本地青年在地缘网络重建与社区归属感上的先天差异;或者比较新就业形态青年,如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与传统稳定就业青年,如企事业单位员工在参与时间结构、公共诉求偏好上的差异。这种基于群体细分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政策工具的精准落地。

三是重构机制的长效追踪。社群化再造与数字反哺在初期往往能有效激发参与活力,但如何避免一阵风式的参与活跃度,将其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社区公共性与互惠契约,仍需未来通过纵向的追踪观察进行深挖。

总而言之,在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拆除青年与社区之间的无形之墙,是一场关乎双向救赎的深刻变革。这不仅能为青年个体在喧嚣且高压的城市中找到一处情感与价值的安放之所,更将为新时代的社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与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 [1] 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J]. 中国青年, 2022(14): 72-75.
- [2] 肖泽磊, 熊麒, 徐一萌. 从“脱域”到“嵌入”: 在职青年城市社区参与的重构[J]. 青年发展论坛, 2025, 35(1): 69-78.
- [3] 姜利波.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域[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5(6): 38-46.
- [4] 徐敏, 刘靖北. 社群化再造: 大城市青年白领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逻辑——基于上海市“青年智谷”的案例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6(1): 52-60+51+119.
- [5] 赵云亭. 青年进社区行动助推社区治理的嵌合式发展路径——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6(4): 66-75.
- [6] (美)罗伯特·D.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 王列, 赖海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80-210.
- [7] 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 [8] (美)罗伯特·D. 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 祝乃娟, 张孜异,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80-195.
- [9] 刘成斌, 王水珍. 资源互惠的悖论: 代际团结现象的系统化阐释[J]. 青年探索, 2026(2): 17-27.
- [10] 吴钊, 杨月. 迈向“分子化”社会的可能: 基于青年社交媒体趣缘搭子自主交往与关系重塑的研究[J]. 新闻与传

播研究, 2026, 33(1): 83-101+158.

- [11] 程德兴, 卫甜甜, 蔡宜旦. 青年发展型社区建设的底层逻辑与实践策略: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以杭州市G未来社区为例[J]. 青年发展论坛, 2024, 34(2): 32-39.
- [12] 庄皓琰. 作为生活策略的青年共居——兼论青年创造性[J]. 青年研究, 2026(1): 67-88+222-223.
- [13] 张华, 雷裕静. 社区传播的“数字生态性”研究——青年遛狗“搭子”社交的扎根分析[J]. 新闻大学, 2025(3): 61-74+121-122.
- [14] 许世存. 激活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青春密码” [J]. 人民论坛, 2025(17): 42-45.